

外交访问、进口挤出与企业福利

何祚宇 梁晓慧 陈勇兵

摘要：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并非简单的促进作用，而是存在非常复杂的作用机制。本文运用2000—2006年的海关数据，考察了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在实证中，设定了一个双重差分模型，并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构建了一个未经处理的过去，以排除外交访问在企业层面的自选择效应。结果表明：当在企业—进口国层面考察问题时，外交访问对国有企业的进口产生了短暂的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口产生了显著且持续的挤出效应，同时外交访问引致非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高于国有企业；机制分析显示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是引致进口挤出的原因；当把视角转换到企业层面对企业福利进行考察时，受到外交访问冲击的非国有企业为抵消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可以灵活地调整进口方向，从而提高了企业利润；国有企业由于将有限资金投入访问国的进口从而为非国有企业空出了其他进口市场，其利润并未有显著的变化。

关键词：外交访问；企业进口；挤出；贸易条件；企业福利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19) 11-0088-12

引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往往是紧密联系的，战争和冲突往往会带来贸易的减少，政治上的友好互动往往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Acemoglu and Yared, 2010^[1]；Aidt and Gassebner, 2010^[2]）。出于双边政治互信和友好军事关系等政治因素的考虑，外交访问不仅带有经济目的，同时也需要兼顾政治利益，有时甚至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服务于政治需求。中国的外交访问往往伴随着“商贸团”的共同出访，同时在领导人的主导下签订相应的“领导人订单”，对访问国进行出口、进口和投资等活动。考察这样的外交活动对于不同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以及进一步考察相关企业福利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指标测度、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7170317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GVC视角下多维贸易成本及其第三国效应：指标测度、理论拓展与经验分析”（719731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本地市场效应与服务贸易增长的内生动力研究：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7160328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生动力研究”（18VSI046）；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及其在贸易政策调整中的应用”（13YJA790152）。

[作者信息] 何祚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梁晓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勇兵（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361005 电子信箱 yongbingchen@163.com。

Pollins (1989)^[3]最早将政治关系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中,他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运用理论模型证明了贸易往来的效用最大化不仅仅包含经济利益,也包含了安全因素。早期的学者更多关注战争和冲突对贸易产生的影响。这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战争和冲突将在长期和短期造成贸易流量的减少。Volker Nitsch (2002)^[4]利用1960—1993年的200个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两国具有政治冲突或者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国家会减少贸易流量,两国政治冲突事件会减少大约4%的双边贸易流量。Glick和Taylor (2010)^[5]发现战争对于两国的贸易和国民收入以及全球福利有着显著且持续的负向影响。Che等(2015)^[6]发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亡率较高的地区,对日的贸易流量也较低。Fouka和Voth (2013)^[7]发现欧债危机下,希腊与德国的贸易冲突引致了德国汽车在希腊的贸易份额下降,尤其是在德军大屠杀的地区下降更为明显。也有部分学者从冲突对第三国影响的视角出发,Martin等(2008)^[8]用模型证明了冲突会提高双边和多边贸易壁垒,但对多边贸易的影响甚微。Gholz和Press (2001)^[9]则认为双边冲突会影响战争冲突国与第三方中立国家的贸易量,但若第三方国家及时调整贸易政策,如提供战时物资、军事设备等产品,则会大大增加本国贸易总额。

关于良好的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国外学者们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分歧。在理论上,Mansfield等(2000)^[10]以及Aidt和Gassebner (2010)指出一个国家政治互动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会通过制定规则强化贸易联系,而对经济管控严格的国家则直接签订贸易订单。因此后者的外交访问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更强,且更直接。然而在实证方面,经济学家们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Rose (2007)^[11]采用22个大国(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建立大使馆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其研究表明首次建立大使馆会显著促进贸易流量的增加。Martincus等(2010)^[12]将贸易分解到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研究发现领事馆或大使馆可以极大促进本国产品种类的增加,而驻外贸易促进机构主要促进同质产品的出口。区别于贸易细分的视角,Yakop (2011)^[13]采用63个进出口国家(地区)数据研究发现,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贸易促进效应与设立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在OECD国家设立没有显著贸易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领导人外交访问作为最高形式的友好政治往来活动,在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及经济贸易往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外交活动的经济效应,Nitsch (2007)^[14]采用美国、德国和法国1948—2003年的数据考察了外交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会提高这些国家8%~10%的双边贸易量。Almqvist (2013)^[15]对瑞典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Head和Ries (2010)^[16]发现加拿大的贸易外交活动对双边贸易仅仅产生了“微弱且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国内关于政治关系对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仅有几篇文献。部分学者研究了政治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潘镇和金中坤(2015)^[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双边关系良好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当东道国是发展中国家时尤为明显。张建红(2012)^[18]采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131个国家(地区)层面数据和面板校正误差模型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友好外交活动在有效促

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还保护了一些敏感和重要的投资项目。也有部分学者从贸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杨攻研和刘洪钟(2015)^[19]采用1980—2013年的季度数据考察了中国与东亚典型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治关系的恶化会显著抑制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但这种关系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有所改善。王学君和田曦(2017)^[20]研究发现总体上外交关系对出口贸易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进一步细分领导人类型来看,总理访问在中短期对出口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国家主席发挥的显著持续作用主要表现在中长期。以上文献主要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与出口贸易往来之间的影响作用,并未将视角转向进口的角度。

综上所述,即使所谓的“自由贸易”国家,其外交活动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仅仅从政治制度解释该问题似乎与现实并不相符,同时其内部机制仍然不明确。Lin(1998)^[21]也指出,政府会利用政府的所有权力追求国家多重目标,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战略等,而这就使得处于转型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成为承担国家政策实施的工具。事实上,外交访问也存在着多重目标,那么从企业层面考察问题,尤其是区分不同企业对外访问的反应,为进一步挖掘外交访问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现有文献通常考察外交访问对宏观贸易流量的影响。这一类研究无法克服样本自选择的问题,即无法分辨究竟是贸易本身驱动了外交访问还是外交访问强化了贸易联系。同时宏观层面的研究无法对外访问的微观影响进行考察,目前的研究尚缺乏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的影响,为现有的研究体系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二是通过企业层面的研究可以降低和消除自选择效应。一方面,领导人不会因为一个企业与某国贸易往来密切而主动出访某国,因此相较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企业层面的研究本身的自选择效应就不强;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的数据提供了足够的样本,使得本文能够构建一个双重差分模型(DID),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排除了自选择效应。三是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访问冲击之下不同企业的福利变化,并探寻了其中的作用机制。

一、实证分析:模型、数据及基准回归

(一)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0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库包含了企业性质、企业进口来源国及企业进口额、产品价格等月度层面的贸易信息,将其合并到年度以进行考察。2000—2005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著的《中国外交》,2006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数据来源于新华网的新闻报道,本文搜集了不同领导人在不同年份访问的国家信息。关于企业利润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他控制变量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和法国前瞻性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CEPII)有关引力模型的数据库,包括了贸易国家的特征变量和国家间距离,以及是否相邻等。

本文主要采用企业—进口国层面的数据考察外交访问的贸易效应,从而降低反向因果关系问题。然而双重差分模型(DID)并不能分析领导人出访问题。首先,

领导人对不同国家的访问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因此难以在时间上找到一个确定的点来分析“过去”和“以后”；其次，在样本开始的第一年就存在外交访问，且每一年都发生外交访问，因此无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鉴于此，本文决定构造出处理组和对照组，使得两组数据拥有共同的“过去”，从而让平行趋势检验成为可能。此外，虽然无法在回归中控制“过去”和“以后”，但是通过一组表示“企业—国家对”组合层面的固定效应（下文简称为企业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时间趋势的控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本文选择了样本期间内比较靠中间的年份 2003 年作为起点，把早于 2003 年外交访问过的国家所对应的样本剔除。2003 年及以后领导人进行访问的国家为处理组，在样本期间内没有任何访问的国家为对照组。此外，本文考察的是外交访问对企业层面进口的影响，因此在回归中使用的是企业—进口国层面的贸易数据。

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Dimport_{ijt} = \beta_0 + \beta_1 visit_{jt} + \beta_2 timetrend_t + \beta_3 X_{ij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与之对应的平行趋势检验如下：

$$Dimport_{ijt} = \beta_0 + \beta_1 treatment_{jt} + \beta_2 timetrend_t \times treatment_{jt} + \beta_3 timetrend_t + \beta_4 X_{ij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其中， $Dimport_{ijt}$ 为企业 i 在 t 年从 j 国的进口增长量，采用进口增长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进口绝对量时间上的相关性（Nitsch, 2007），得到的结果可能更为准确； $Visit_{j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 DID 的交互项，在样本期间内，当领导人对某个国家进行首次访问之后取 1，其他情况取 0。 $timetrend$ 为时间趋势项，即 2000 年定义为 1，2002 年定义为 2，依此类推。 X_{ijt} 为控制变量组，包括了表 1 涵盖的引力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1。还包括企业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t 小于 2003，表示在此期间内，无论是处理组还是对照组都没有被外交访问过， $treatment$ 表示外交访问的虚拟变量，如果在 2003 年之后领导人进行了访问则取 1，否则取 0。如果它的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在外交访问之前，企业对未来访问国家与非访问国家的贸易增量并无差异。 $timetrend \times treatment$ 为时间趋势项与处理组的交互项，如果不显著则说明企业对不同国家贸易增长量没有时间趋势上的差异。在满足上述条件时，回归能够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从而排除自选择效应。对于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定义
<i>Dimport</i>	417 311	380 978.1	1.51e+07	-1.24e+09	3.11e+09	企业进口增加值
<i>visit</i>	806 006	0.2464969	0.8238512	0	3	进口来源国被出访及以后定义为 1
<i>timetrend</i>	806 006	4.45389	1.969002	0	1	2000—2006 年分别定义为 1—6
<i>treatment</i>	806 006	0.2636767	0.4406263	0	1	2003 年之后定义为 1，之前为 0
<i>contig</i>	802 198	0.2045256	0.4033548	0	1	贸易双边国家地理相邻为 1，否则为 0
<i>lngdpper</i>	508 111	9.371223	1.265983	4.663599	11.81768	进口来源国的人均 GDP
<i>landlocked</i>	802 963	0.0864037	0.2809595	0	1	进口来源国是内陆国定义为 1，否则为 0
<i>gatt_d</i>	802 198	0.9091022	0.2874638	0	1	进口来源国是 GATT 成员定义为 1，否则为 0
<i>price</i>	4 016 100	4 618.088	268 297.5	0.0000385	0.173	企业进口价格
<i>profit</i>	82 447	12 282.77	155 628.2	3 506 780	1.74e+07	企业营业利润
<i>Qotherdimport</i>	335 051	3.5569	159.5814	-11 223.28	32 477.84	企业从未被出访过国家的进口增加

(二) 基准回归结果及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首先对模型(1)进行了基准回归,同时为探究模型设定了合理性,进一步回归了模型(2)的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外交访问的进口效应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visit</i>	-8.125*** (-8.842)	-8.875*** (-9.535)	-8.210*** (-7.048)	-8.794*** (-7.440)	-8.931*** (-7.543)
<i>timetrend</i>	0.097 (0.501)	0.129 (0.665)	1.353*** (4.842)	1.363*** (4.876)	1.346*** (4.817)
<i>contig</i>		-2.540*** (-3.457)	3.649*** (3.155)	2.214* (1.760)	2.088* (1.658)
<i>lngdpper</i>			-4.051*** (-9.867)	-3.535*** (-7.898)	-3.558*** (-7.947)
<i>landlocked</i>				-4.349*** (-2.898)	-4.408*** (-2.937)
<i>gatt_d</i>					6.466** (2.069)
<i>_cons</i>	4.325*** (4.602)	4.767*** (4.988)	35.958*** (9.415)	32.113*** (7.942)	26.117*** (5.251)
企业—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417 311	416 263	272 362	272 362	272 362
R ²	0.118	0.119	0.114	0.114	0.115

注: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外交访问的进口效应整体为负,无论如何添加控制变量,结果总是显著的。一般而言,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外交访问总会带来“领导人订单”从而扩大两国的贸易流量,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会增加。然而实证结果却与本文的预期相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企业层面外交访问引致了企业进口的整体减少,对企业进口产生了“挤出”效应。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treatment*还是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因此回归不存在自选择效应,这也是进一步分析问题的基础。

表3 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	(1) 2003年	(2) 2004年
	<i>Dimport</i>	<i>Dimport</i>
<i>treat</i>	1.281 (0.246)	-4.072 (-1.124)
<i>timetrend</i> × <i>treatment</i>	-0.740 (-0.376)	0.809 (0.740)
<i>timetrend</i>	1.922* (1.705)	1.398** (2.282)
<i>contig</i>	4.214** (2.211)	2.873* (1.811)
<i>lngdpper</i>	-3.374*** (-5.386)	-4.007*** (-7.612)
<i>landlocked</i>	1.308 (0.596)	0.344 (0.187)
<i>gatt_d</i>	-17.081*** (-4.744)	-17.690*** (-5.903)
<i>_cons</i>	42.881*** (6.251)	52.154*** (9.332)
N	69 270	105 598
R ²	0.083	0.079

注: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分样本回归及机制讨论

(一) 企业所有制与进口的挤出

得益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可以从企业所有制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将样本拆分成了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通过如下的回归方程探讨外交访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所产生的影响:

$$Dimport_{ijt} = \beta_0 + \beta_1 after1_{jt} + \beta_2 after2_{jt} + \beta_3 after3_{jt} + \beta_4 timetrend_t + \beta_i X_{jt} + \varepsilon_{ijt} \quad (3)$$

如方程(3)所示,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变为 $after_1$, $after_2$ 和 $after_3$, 分别考察首次访问当年、访问1年以后以及访问2年以后相应企业在进口国的进口量变化情况^①。方程(3)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外交访问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在外交访问发生的当年,国有企业的进口量有了短期的不太显著的正向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第2年和第3年迅速消失。而非国有企业显示出了一种持续的、稳定的挤出效应。

表4 分样本回归结果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Dimport</i>
<i>after1</i>	11.609** (1.964)	11.594* (1.949)	7.437 (1.066)	-6.402*** (-5.703)	-7.159*** (-6.347)	-5.571*** (-4.495)
<i>after2</i>	-9.563 (-1.604)	-9.614 (-1.600)	-14.690** (-2.050)	-10.245*** (-8.681)	-11.088*** (-9.350)	-9.656*** (-7.356)
<i>after3</i>	-7.480 (-1.122)	-7.564 (-1.128)	-13.098 (-1.637)	-11.319*** (-7.010)	-12.181*** (-7.525)	-9.981*** (-5.586)
<i>timetrend</i>	2.050** (2.412)	2.076** (2.431)	4.323*** (3.844)	-0.352** (-2.099)	-0.332** (-1.980)	0.498** (2.195)
<i>contig</i>		0.529 (0.156)	-0.084 (-0.018)		-2.950*** (-4.679)	3.693*** (3.448)
<i>lngdpper</i>			-1.215 (-0.744)			-4.258*** (-11.071)
<i>landlocked</i>			-3.731 (-0.752)			-4.004*** (-3.070)
<i>gatt_d</i>			6.249 (0.584)			5.441** (2.021)
<i>_cons</i>	-4.144 (-1.114)	-4.341 (-1.147)	-5.811 (-0.333)	6.378*** (7.657)	6.969*** (8.227)	36.304*** (8.449)
N	59 052	58 869	45 777	358 259	357 394	226 585
R ²	0.088	0.088	0.096	0.156	0.157	0.157

注: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大型国有企业作为实施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工具,往往在行动上与国家的外交利益保持一致,因此在领导人访问的当年会大大增加对被访问国的进口。然而,由于受到市场因素和企业内部利益的综合影响,这种非市场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在第

^①方程(3)中 $after1$ 、 $after2$ 、 $after3$ 是由方程(1)中的双重差分项 $Visit$ 拆分而来的,用于进一步考察外交访问的长期经济效应。

2年及以后国有企业的进口量会出现回落。此外，领导人出访显著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口增长，这种抑制作用在当期及后期均显著。这说明领导人出访尽管当期带来国有企业的进口增加，但同时挤占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口资源，这无疑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误置。从表4的第(4)、(5)、(6)列可以看出，这种资源误置在第2年及以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加大。回归结果也验证了Fan等(2007)^[22]的研究，即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时，可能更多地考虑实现政府的目标而较少关注企业的福利最大化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 外交访问与进口企业的进入退出

本文考察了外交访问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引致了国有企业进口在短期出现一定的增长，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外交访问引致了进口长期且持续的挤出。那么，外交访问将如何影响企业在相应国家的进入和退出呢？众所周知，领导人访问一国时通常会带着一支或几支庞大的“商贸团”，那么这样的出访是否会带动这些商贸团所代表的新企业的进入以及减少已有企业的退出，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定义企业前1年($t-1$ 期)没有进口贸易，而当年(t 期)有进口贸易的企业为进入；同理，定义前1年($t-1$ 期)有进口贸易，而当年(t 期)没有进口贸易的企业为退出。随后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以考察外交访问发生的当年，不同类型的企业进入和退出相应国家进口市场的情况：

$$D_{ijt} = \lambda_1 + \lambda_2 after1_{jt} + \lambda_3 X_{jt} + timetrend_t + \varepsilon_{ijt} \quad (4)$$

其中， D 在不同的回归中分别代表进入或退出， $after1$ 代表领导人访问当年的虚拟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方程(4)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企业类型 被解释变量	(1) 总体 $D_{退出}$	(2) 总体 $D_{进入}$	(3) 国企 $D_{退出}$	(4) 国企 $D_{进入}$	(5) 非国企 $D_{退出}$	(6) 非国企 $D_{进入}$
<i>after1</i>	-0.210*** (-79.142)	0.175*** (83.714)	-0.109*** (-18.822)	0.040*** (8.441)	-0.236*** (-78.704)	0.201*** (85.336)
<i>timetrend</i>	0.168*** (440.966)	-0.205*** (-594.513)	0.122*** (129.819)	-0.122*** (-142.499)	0.175*** (417.256)	-0.223*** (-586.471)
<i>contig</i>	-0.044*** (-17.593)	-0.036*** (-15.419)	-0.097*** (-14.549)	-0.084*** (-13.948)	-0.041*** (-14.922)	-0.038*** (-14.862)
<i>lngdpper</i>	-0.031*** (-49.455)	-0.033*** (-56.713)	-0.066*** (-43.915)	-0.068*** (-49.903)	-0.024*** (-34.451)	-0.029*** (-44.131)
<i>landlocked</i>	0.094*** (27.113)	0.168*** (51.347)	0.111*** (15.116)	0.160*** (23.825)	0.094*** (23.835)	0.186*** (49.321)
<i>gatt_d</i>	-0.038*** (-8.134)	0.018*** (4.108)	-0.024** (-2.542)	-0.031*** (-3.735)	-0.046*** (-8.472)	0.018*** (3.460)
<i>_cons</i>	-1.046*** (-155.711)	0.750*** (121.140)	-0.614*** (-40.942)	0.728*** (53.659)	-1.126*** (-147.932)	0.801*** (113.508)
N	3 629 764	3 629 764	611 933	611 933	3 017 831	3 017 831

注：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分别代表1%、5%的显著性水平。

表5第(1)列和第(2)列分别表示所有进口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领导人出访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的概率，与此同时提高了企业退出的概率。事实上，从企业

的进入和退出可以看出外交访问所引致的挤出效应不仅存在于私有部门,同样存在于国有部门。这说明外交访问虽然在短期引致了国有企业进口的增加,但是这样的增加仅仅作用于有限的参与到“访问团”中的国有企业,而对于其他国有企业,外交访问将增加其退出相应国家的概率,降低其进入相应国家的概率。从系数上来看,这样的基础效应对于私有企业来说更加明显。

外交访问对国际贸易的“干预”不仅降低持续存在企业的进口量,甚至会使已有企业退出进口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获得国外进口资源的积极性。本文推断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具有多重目标的“外交订单”以较高的进口价格换取某些非贸易的好处,例如政治上的认可、日后的投资机会以及贸易壁垒的下降等。而引致这种普遍性挤出的主要机制可能是“外交订单”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变化。

(三) 机制分析: 外交访问与贸易条件变化

除了少数国有企业进口量有短期的增加之外,本文发现外交访问对其他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带来了一种持续的挤出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企业进口挤出的内在机制。本文认为,“外交订单”的签订可能存在多重目的,因此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往往会排在政治利益之后,所以“外交订单”可能会抬高进口品的价格,引致贸易条件的变化。过高的进口价格将引致未签订“外交订单”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基于经济利益降低进口甚至退出市场。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本文重新整理中国海关数据,计算了每个国家每个月HS8位数上不同产品的价格。为了考察外交访问对进口品价格的影响。运用国家—产品层面的月度价格数据设定了如下方程:

$$Price_{ijt} = \lambda_1 + \lambda_2 Visit_{jt} + \lambda_3 X_{ijt} + \varepsilon_{ijt} \quad (5)$$

其中, $Price_{ijt}$ 表示 i 产品在 j 国 t 时间的价格, $Visit_{jt}$ 表示外交访问的虚拟变量, X_{ijt} 为控制变量组。方程(5)的回归结果见表6。

表6 外交访问与贸易条件的变化

被解释变量	(1) Price	(2) Price	(3) Price	(4) Price	(5) Price	(6) Price
<i>Visit</i>	55.276 *** (7.277)	11.263 *** (2.956)	42.300 *** (5.470)	3.596 (0.926)	34.284 *** (4.289)	12.169 *** (3.036)
<i>timetrend</i>	57.211 (0.631)	279.086 *** (6.039)	76.580 (0.838)	315.913 *** (6.781)	150.027 (1.611)	238.239 *** (5.023)
<i>contig</i>			-1143.844 ** (-2.507)	-1848.525 *** (-8.011)	-1888.447 *** (-4.011)	-1354.898 *** (-5.697)
<i>lngdpper</i>			1647.549 *** (14.957)	413.907 *** (7.162)	1876.768 *** (16.194)	257.062 *** (4.249)
<i>landlocked</i>					-504.695 (-0.845)	1736.154 *** (5.756)
<i>gatt_d</i>					-5574.033 *** (-6.452)	3368.399 *** (7.679)
<i>_cons</i>	3196.549 *** (12.424)	3463.320 *** (26.360)	-1.23e+04 *** (-11.341)	-268.654 (-0.473)	-9079.961 *** (-7.571)	-2113.668 *** (-3.377)
HS8 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	4016100	4016100	4003845	4003845	4003845	4003845
R ²	0.000	0.756	0.000	0.756	0.000	0.756

注: 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 **、*** 分别代表1%、5%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怎么改变控制变量，甚至为每一种产品都加上一个固定效应，*Visit*的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这说明外交访问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而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是引致企业进口被挤出的原因之一。

三、外交访问对企业福利的影响

(一) 外交访问对企业营业利润的影响

外交访问所引致的贸易条件变化引致了非国有企业进口的挤出，但挤出并不一定降低福利，因此对企业福利有何种影响，是否会抑制企业的发展，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为了在企业层面讨论外交访问对企业福利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如下方程：

$$Qprofit_{it} = \beta_0 + \beta_1 QVisit_{it} + \beta_2 timetrend_{it} + \beta_i X_{it} + e_{it} \quad (6)$$

为了获得企业的利润数据，本文按照企业名称、企业电话号码后6位、企业邮政编码及法人代表等指标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方程中被解释变量 *Qprofit* 表示企业的营业利润；*QVisit* 表示企业受到领导人访问的冲击，即领导人在当年如果出访了企业的某个进口国，则标记为1，否则为0；*timetrend* 是时间趋势项，此外还加入了与方程(1)中相同的控制变量 *X*。

表7 外交访问对企业营业利润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国企 <i>Qprof</i>	(2) 非国企 <i>Qprof</i>	(3) 国企 <i>Qprof</i>	(4) 非国企 <i>Qprof</i>	(5) 国企 <i>Qprof</i>	(6) 非国企 <i>Qprof</i>
<i>QVisit</i>	4 565.060 (0.173)	8 882.651*** (4.149)	239.178 (0.009)	9 069.883*** (4.228)	-467.832 (-0.018)	9 117.598*** (4.251)
<i>timetrend</i>	12 520.229** (2.435)	1 905.728*** (4.117)	12 385.592** (2.385)	2 049.672*** (4.404)	12 445.661** (2.395)	2 096.060*** (4.471)
<i>lngdpper</i>	-4 517.271 (-0.566)	-116.901 (-0.204)	1 159.612 (0.137)	-1 751.248** (-2.271)	5 456.521 (0.529)	-2 379.217** (-2.259)
<i>Contig</i>			-5.05e+04** (-2.332)	6 807.740*** (3.200)	-6.61e+04** (-2.420)	8 274.499*** (2.804)
<i>landlocked</i>					-2.79e+04 (-0.884)	3 247.657 (0.824)
<i>gatt_d</i>					1.33e+05 (1.236)	32 884.309*** (3.238)
<i>_cons</i>	37 466.522 (0.463)	6 842.322 (1.189)	2 204.621 (0.026)	17 929.268*** (2.654)	-1.58e+05 (-1.151)	-1.01e+04 (-0.764)
N	1 454	35 600	1 444	35 540	1 444	35 540
R ²	0.947	0.889	0.947	0.889	0.947	0.889

注：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分别代表1%、5%的显著性水平。

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外交访问对国有企业的营业利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却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营业利润，当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保持高度一致，非国有企业在外交访问国市场的退出反而使得营业利润有所上升。为了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内在原因，本文讨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贸易环境变化时的不同反应。

(二) 外交访问与企业进口方向的调整

本文接着考察企业从那些未访问过国家的进口的变化。回归方程设计如下：

$$Qotherdimport_{it} = \beta_0 + \beta_1 QVisit_{it} + \beta_2 Firm_i + \beta_3 Vi - Fi_{it} + \beta_4 X_{it} + e_{it} \quad (7)$$

其中， $Qotherdimport_{it}$ 表示企业*i*从未访问过国家的进口量变化； $QVisit_{it}$ 表示企业受到领导人访问的冲击； $Firm_i$ 为非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即企业*i*为非国有企业取值为1，企业*i*为国有企业取值为0；核心解释变量是交互项 $Vi-Fi$ ，表示领导人访问当年，企业从出访国调整进口的向未出访国调整进口的进口量变化。此外也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表8 外交访问与企业进口方向的调整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i>Qotherdimport</i>	<i>Qotherdimport</i>	<i>Qotherdimport</i>	<i>Qotherdimport</i>
<i>Firm</i>	2.050 (0.805)	-1.113 (-0.235)	-1.085 (-0.229)	-1.099 (-0.232)
<i>QVisit</i>	7.704*** (2.887)	7.988 (1.642)	8.159* (1.677)	8.012* (1.646)
<i>Vi-Fi</i>	11.643*** (4.476)	8.496* (1.765)	8.696* (1.806)	8.633* (1.793)
<i>contig</i>	0.256 (0.292)	3.810* (1.717)	6.672** (2.378)	6.703** (2.389)
<i>lngdpper</i>		-2.069** (-2.565)	-3.056*** (-3.053)	-2.939*** (-2.931)
<i>landlocked</i>			6.084* (1.666)	6.182* (1.693)
<i>gatt_d</i>				-17.589* (-1.849)
<i>_cons</i>	0.134 (0.058)	22.675*** (2.752)	29.782*** (3.210)	46.083*** (3.601)
<i>N</i>	333 859	155 873	155 873	155 873
<i>R</i> ²	0.392	0.523	0.523	0.523

注：括号内为回归的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表8的回归结果显示，当面临外交访问冲击时，非国有企业能够更为灵活地调整进口方向，扩大对未被访问国家的进口，以抵消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进口需求基本是稳定的，当增大在出访过的国家进口时，受制于有限的财力和精力，可能会减少在其他市场的进口，这就为非国有企业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进口市场；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有着相对自由的选择空间，同时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也会调整自己的进口方向，主动寻找那些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地以规避贸易损失，从而增加了非国有企业从未被出访国家的进口。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运用2000—200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考察外交访问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在实证中，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双重差分模型，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构造了一个未经处理的状态，以识别外交访问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不同影响，国有企业对访问国的进口有短暂的增加，而非国有企业的进口则出现了持续且显著的下降。随后进一步考察了外交访

问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对非国有企业的进口挤出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接着,讨论了进口挤出的机制,运用产品层面的月度价格数据,发现外交访问显著提高了从相应国家进口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能是引致企业进口挤出的关键原因。最后,在企业层面,分析了外交访问对企业福利的影响,发现外交访问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然而对国有企业利润则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非国有企业在面临外交访问冲击时灵活地调整了进口方向,从而扩大了对非访问国的进口,而非国有企业却没有根据贸易条件对进口方向进行调整。

外交访问存在双重目标,经济上希望获得国外的资源,而政治上希望得到访问国的支持以及某些长期利益。当两者目标不一致时,政治目标往往优先于经济目标。外交访问所签订的“外交订单”,往往通过较高的价格向访问国让渡一些经济利益以获得其在政治上的支持,部分国有企业担当了经济外交活动实施的角色。然而非市场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外交订单”将引致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其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种非市场行为不仅对企业造成了资源误置,同时也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福利。因此,从长远来看,应当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才能够达到合作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D, YARED P. Political Limits to Globalization[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0, 100(2):83-88.
- [2] AIDT T S, GASSEBNER M. Do Autocratic States Trade Less?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7, 24(1):38-76.
- [3] POLLINS B M. 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9, 83(2):465-480.
- [4] NITSCH V. Honey, I Shrank the Currency Union Effect on Trade[J]. World Economy, 2002, 25(4):457-474.
- [5] GLICK R, TAYLOR A M. Collateral Damage: Trade Disruptio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r[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102-127.
- [6] CHE Y, DU J, LU Y, TAO Z. Once an Enemy, Forever an Enemy?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1937 to 1945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6(1):182-198.
- [7] FOUKA V, VOTH H J. Reprisals Remembered: German-Greek Conflict and Car Sales during the Euro Crisis[J]. Working Papers, 2013.
- [8] MARTIN P, THOENIG M M. Make Trade Not War?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3):865-900.
- [9] GHOLZ E, PRESS D G. The Effects of Wars on Neutral Countries: Why It Doesn't Pay to Preserve the Peace[J]. Security Studies, 2001, 10(4):1-57.
- [10] MANSFIELD E D, MILNER H V, ROSENDORFF B P. Free to Trade: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305-321.
- [11] ROSE A K. The Foreign Service and Foreign Trade: Embassies as Export Promotion[J]. The World Economy, 2007, 30(1):22-38.
- [12] MARTINCUS C V, ESTEVADEORDAL A, ANDRÉS GALLO, et al. Information Barriers, Export Promo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0, 146(1):91-111.
- [13] YAKOP M, VAN BERGEIJK P A G. Economic Diplomacy, Trad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Cambridge Jour-

- nal of Regions Economy & Society, 2011, 4(2):253-267.
- [14] NITSCH V. Honey, I Shrunk the Currency Union Effect on Trade[J]. World Economy, 2002, 25(4):457-474.
- [15] ALMQVIST A. A Royally Good Idea?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wedish State Visits and Aggregate Swedish Merchandise Exports. [J]. Business & Economics, 2013.
- [16] HEAD K, RIES J. Do Trade Missions Increase Trad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10, 43(3):754-775.
- [17] 潘镇, 金中坤.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 财贸经济, 2015, 36(6):85-97.
- [18] 张建红, 姜建刚.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12):133-155.
- [19] 杨攻研, 刘洪钟. 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2):110-130.
- [20] 王学君, 田曦. 外交访问的贸易创造效应——中国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6):17-28.
- [21] LIN J Y, CAI F, LI Z.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2):422-427.
- [22] FAN D K K, LAU C M, YOUNG M. Is China's Corporate Governance Beginning to Come of Age? The Case of CEO Turnover[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07, 15(2):105-120.

(责任编辑 王 瀛)

Diplomatic Visits, Imports of Extrusion and Welfare of Enterprises

HE Zuoyu LIANG Xiaohui CHEN Yongbing

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plomatic visits on import of companies is not only simply promotion, but has very complicated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used the customs data from 2000 to 2006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plomatic visits on business import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we set up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and constructed an unprocessed past for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o rule out the self-selection effect of diplomatic visits at the firm level. When examining issues at the enterprise-importing lev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diplomatic visits have a temporary boosting effect on the import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have produced significant and sustained crowding-out effects on the imports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Meanwhile, we fin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iting the market is higher th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shows that changes in trade conditions may be the cause of the import squeeze. When the perspective is switched to the corporate level to examine corporate welfa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t are hit by diplomatic visits could flexibly adjust the direction of imports in order to offse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rade conditions, thereby increase corporate profits. Howe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fits have not made significant changes because they have invested limited funds in the imports of visiting countries, vacated other import markets for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words: Diplomatic Visit; Importing of Firm; Extrusion; Trade Conditions; Welfare of Enterprises